

02

塘沽文史資料輯

1992

(三)

塘沽文史资料辑

(三)

一九九二年元月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天津市塘沽区委员会编

主 编：刘 俊

副 主 编：李 炜

编 委：刘 俊

张庚戌

张克辉

孟 蒙

郭有龄

李 炜

薛献之

姜洁如

陈河乐

顾秉华

郭有龄

叶介夫

李全乃

高近远

顾秉华

赵海鹏

孟庆华

执行编辑：于 辉

不安于故俗
不溺于旧闻

辛未夏書 韓蘭田

中共塘沽区委书记韩兰田同志
为本辑题词

编者的话

《塘沽文史资料辑》(三),于不声不响中和大家见面了。

平淡无奇,是这个集子的风格。这里没有海河的波涛汹涌,没有大沽炮台的火光冲天。倘以此认为这个集子没有可读性,那就错了。

作为这个集子首篇的《辛酸的回忆》(葛国宪整理),写的是海峡两岸亲人间的思恋之情。这样的内容,今天的读者已非鲜知。但由于整理者不时变换叙述角度,把读者置于两者之间,倾听着他(她)们的述说。听到伤心处,不免掬一把同情泪。伴着泪水从心底发出一声:痛,莫大于分离!这样的局面还不应尽早结束吗?!这个呼唤,就是这篇文史稿的意义所在。

《久大盐业公司始末》是年逾八旬的薛公献之用颤手写成的。他以历史见证人的身份,记叙了这个蜚声中华大地私营企业由兴起到合营的全过程。其中不乏惊人之笔和感人之处。特别是老人对当时国家高层领导干部,诸如何长工等同志廉洁作风和平易风貌的追叙,对于今天的廉政建设不无裨益。

马连华同志的《塘沽市容变迁》,以清新、简洁的文笔,为我们展现了塘沽由拙朴到秀美的长卷。既是一部城市发展史,又是一副塘沽风俗画。

“越俎代庖”为文者一忌,其他篇目就留给读者细细品味了。

365P134

这里还需提及的，是资料与正史的关系。特别是政协文史资料是以“三亲”（亲身经历、亲眼得见、亲耳所闻）为特色，对正史有参考、补充和匡正作用，但不能当作正史来读。因为正史是对大量资料综合研究的成果。换句话说，作为文史资料，无论是写人还是论事，都是一家之说，而不是历史论定。明白了这一点，大家都可平心静气了。

纰漏之处，不吝指教。

一九九二年元月

目 录

辛酸的回忆.....	葛国宪整理 (1)
执教生涯及其他	阿 乐 (18)
塘沽市容变迁	马连华 (28)
塘沽医药史略	封呈祥 (36)
引滦前的塘沽供水	郭凤图 (55)
久大盐业公司始末	薛献之 (69)
塘沽版画	赵海鹏 (82)
盐场大鼓.....	乔宪玲 (119)
灯官会在北塘.....	毕树发 (122)
侯德榜在永利建厂的岁月里.....	任 效 (124)
我的曾祖张文诤.....	张 瑶 (134)
父亲刘唯尧.....	刘开成 (139)

辛酸的回忆

——记田玉山去台前后

葛国宪 整理

按：田玉山先生 1948 年底随挖泥船去了台湾，1988 年回到家乡东沽定居，与妻子、儿孙团聚。

四十年的经历，充满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现根据田先生及其家人的叙述，整理如下：

解放前我家生活贫苦

我父亲田立忠是独生子，一生靠给人家泥房、拾柴禾、做小生意为生。祖父田桂发 1942 年闹成年时活活饿死。我母亲是葛沽人。一次回娘家，给我定了一门亲事，当时女方才六岁，我比她大九岁。她十五岁嫁到了我家，出嫁时连个被子都没有。我们时常吃这顿没那顿，转年因实在没有吃的了她不得不去很远的盐工窝棚去要饭，脚都磨起了水泡，盐工们生活也很苦，她往往是空手而归。一次，她带着刚要来的饭回到家，我的二祖父已被活活饿死，用破席卷走了。二祖父和我祖父是同年饿死的。

我很小就跟父亲干活。有时溜海边，拾漂到海边的东西；有时拾网眼。大一点后就到船上给锅炉敲锈或到船坞去挖泥。一天仅挣两毛小洋国币，“把头”还得要一点。

生活所迫我当了船员

这样无着无落地生活，没有保障，我父母便托姓王的邻居介绍让我上了“B1”号驳轮。那年我十五岁这是我第一次当船员，该船是英国太古洋行的。当时英国租界在天津，塘沽于家堡有个太古码头。“B1”号有船员 13 人，驾长叫倪万顺是我祖父的拜把兄弟。我在船上做水手工作，每月挣两块银元，可买四十斤玉米粉。

18 岁时我由“B1”号船转到“A4”号船，有船员 12 人，我负责给船员做饭。第二年芦沟桥事变，日本人进关封锁了英、法、意等国在天津的租界，接收了太古洋行，解雇了所有船员，“A4”船去了上海。当时太古洋行有驳轮“B”字号船 5 条，2 条单桅船，“C”字号船有 2 条，“A”字号有 12 条。

我从船上下来又受日本人奴役，干抬土筑埝，保盐滩的活。监工是日本人和朝鲜人。1940 年我又去新港干临时工，架接吹泥管吹填北疆，一起干活的工人有很多是被日本人从外地抓来的。日本人对我们很狠，活很累，吃饭不管饱，工伤不给治。传染病盛行，累死病死了许多人，日本工头怕有病的工人传染就把还有气的病人也拉走扔到于家堡前面的万人坑里。那里埋了许多工人。野狗吃死人都红了眼。见着活人也“汪汪”叫，我们上下班只好拿着棍子结伙走路。1945 年日本人战败投降，日本监工都低了头，以前的威风断然无存了。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来后，我被分配到“塘沽一号”船任挖泥长，负责水手长工作。这条船原名“金龙号”是日本的挖泥船，日本投降后改为“塘沽一号”，该船有船员 30 人，船的载重量 1000 多吨。1947 年我又被调到“塘沽九号”挖泥船任

副驾驶，负责挖泥船身调动。1948 年从美国开回来了“建港一号”挖泥船。这条船为自航，可以自己取泥，卸泥。不用托轮自己行驶。该船一到港，就在其它各船上选拔了优秀船员 53 名上了“建港一号”。我被选上了，心情特别高兴。为的是这条船技能先进又能跑远程，工资比在别的船上高，还有出差费可多挣钱养家糊口。我父母、太太也都为生活将有所好转而眉开眼笑。我在该船任副挖泥长，负责挖泥，吹泥，送泥、倒泥工作。53 名船员刚到齐四天，该船就准备去青岛修船，开放泥门和工具。这条船从美国开来，路途遥远风大浪急为了安全，将泥门和船面上的挖泥工具都焊了。那时新港仅有一小船坞，修不了这条船，我们只好开赴青岛。当时这种自航挖泥船从美国买进两艘起名为建港“一号”、“二号”，建港一号去了台湾，建港二号一直在塘沽新港工作。从此两条船再也没有汇合过。

谁知是去台湾

1948 年 10 月 17 日“建港一号”准备启航去青岛。我和几个船员在船上值班，让其他船员回家取衣物食品，那时辽沈战役已经打响，国民党加强了对塘沽的控制，18 日晨 5 点他们封锁了河口。海河的摆渡船停止工作。上午 10 点“建港一号”船到大沽口锚地等候船员返回，11 点左右船员到齐。他们给我带来了母亲和太太给我准备的米和鞋。十二点“建港一号”船载着 53 名船员离开了新港，告别家乡远航了。按原计划两至三周返回新港，谁知一去就是四十多年，我们走得是那样仓促而平常，未向父母大人告别，也没再看看妻子和两个孩子，那时我的次子才一岁。我是独生子无兄弟姐妹，我走了一家老小谁来照顾啊！

10月20日晚，“建港一号”驶进了青岛海军修造所船坞。进行了开封，修船。两周后船出坞，又停靠在青岛港二十多天。船主知道天津战事吃紧，便用汽车给船装上燃料油，开往上海，停靠在吴淞口物资供应局码头。这时我们船员心里越来越害怕，知道暂时回不了家，家中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我们上有老下有小的，个个像热锅上的蚂蚁。

“建港一号”船直属国民党交通部。交通部给船长来电报，指示该船由台湾港务局调动。台湾港务局派来了名叫王永衡的，办理了船用燃料油等物资。1949年春节前夕，“建港一号”又载着我们53名船员开往台湾。越往前开离家乡越远了。越开离亲人越远了。春节几天我们正在台湾海峡行驶，我们在海上过了离家后的第一个春节。没有节日的鞭炮齐鸣，没有妻儿老小的欢声笑语，我只身一人在船的边上偷偷地落泪，只听见机器的轰鸣，它好象父母大人思念儿子的哭声；只看见那哗哗而过的海水浪花，它好似母亲，太太、孩子们的泪水，老天爷真捉弄人，就这样我不明不白糊里糊涂地去了台湾。

日思夜想盼回家

我们随“建港一号”到台湾后，由高雄港务局调动挖泥疏港。1965年该船因船体机械老化被解体拆除。“建港一号”1908年由日本制造。我自1948年登轮到船的解体，一直任船上的挖泥长。船解体后，我到陆地上一个工厂看门，因不识字不适应工作，又到安平港一条挖泥船上工作。1976年我已六十多岁，只好在高雄先租后买了房子靠吃积蓄为生，过起了孤苦伶仃的老人生活。在船上有活干转移了我的注意力，心情还好些。没有工作呆在屋里更是日思夜想盼返家。

我非常注意保健身体，吃喝住行都特别加小心，日常生活省吃俭用总想多存点钱等待有朝一日带回家去，我不讲究衣着，从不倒剩菜剩饭，不乱花一分钱，歪的邪的我更不干。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我怕病了没有人抢救照顾连个帮忙的人都没有。开始我们四、五个老光棍儿租一间房住，但人一多又不便于休息，也不好租到房。有房的人愿意将房租给有妻子儿女的，不愿租给光棍老头。为了能更好地休息，我和同去台的船员马凤荣先生一同合资先租后买了房子。我们两个老人住在一起相依为命。租房生活受气，房主经常说三道四，讲“外面租房费又提高了”，让你好难受。自己买的房生活自在，吃好吃次没人笑话。

到台湾几年后大家看到回家无望。有的船员老乡要给我介绍对象，劝我结婚另成一个家。我凭着良心决意不娶，我的太太一人在家照顾两个老人、两个孩子，千斤重担一人担，我怎么能另娶她人呢，那怎么对得起她！

一年又一年我的年龄越来越大，自感到老了许多，怕得病而突然离开人世，就和同乡船员刘连贵先生用三万台币买下了各自的墓地。1980年刘连贵病重了，我们细心照顾他，他病故后，我们将他安葬在他自己买的那块墓地，终年70岁客死他乡了。

每年中秋节时，自然界是金秋季节，到处是美色，但这一切在我的眼里，心里却感到那么的肃穆，凄凉。晚上，我默默地坐在船的平台上，站在院子里，仰望在薄云缝里穿行的月亮闪着清淡的光。虽是十五的月亮，但我却看不出它有多圆。我想此刻父母及家人可能也在月下盼着我早日回到他们的身边。我每次望着明月，想着家人，都呆到深夜。

在台湾我最怕过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那几天是

我最难熬的日子。同去台湾的同乡船员有的携妻带子来看我，他们那一声声“田大爷”拜年的声音，好像在揪我的心，扯我的肝，声声带血、带泪。我不是怕给拜年来的乡亲们小红包，我想父母、妻子，想那身边没有父亲的孩子，每逢春节，我独自一人在屋里默默地落泪，无声无息地将这几天熬过去。

我们同去台湾的 50 多位船员，在一起工作了三、五年后，其中 30 多人陆续到陆地上的厂家工作，有的到了别的近海船上，也有的为了多挣点钱上了跑远洋的轮船。

与我同住的马凤荣先生，1948 年来台前在家乡东沽定了亲，准备转年结婚，那时他 19 岁，现在已 60 多了，孑身一人，孤独一生。

有的船员为了精神上有个寄托，知道回家无望，无奈在台结婚生子。有的取了寡妇为妻，将养子带大后，养子看不起当船员的养父，张口便骂，随意挥霍养父辛苦赚来的钱，最后把养父赶到用铁皮搭的临时住房中住，他们对我说悔之当初不应结婚。有的思乡心切，没有坚强的意志，克服不了孤独而带来的痛苦，精神失常了。

船员陈希思刚到台湾第三年因痛症病倒了，我们象亲人一样照顾他。他死后，我们塘沽老乡 30 多人，请了吹吹打打的假道士给他送葬。火化后，将他骨灰放在龙泉寺庙 15 号，每年春节，清明，我们为他扫墓，烧纸钱，交管理费，他的死对我们震动很大，我们将来也会如此吗？身边无妻子、儿女，只有同事朋友，很可能还不如他，有这么多人送葬，年年有人看望呢。

船员姜红喜 60 多岁在台湾病故。他去世前拜托乡亲们一定要将他的骨灰带回家乡，愿在故乡安眠。我和船员沈兆

明按照他的遗愿，将他的骨灰托人由船带到了香港。姜红喜的太太由塘沽到香港，抱着她的分别四十多年的丈夫的骨灰返回塘沽。安放在四道桥宾馆。

他走后我的眼泪都哭干了

1948年阴历十月十六日晚，是我的丈夫田玉山去台前与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个夜晚。吃罢晚饭，一切和往常一样。怕早晨起不来，田玉山和公公在里屋睡，我与婆婆带两个孩子在外屋睡。知道他要随船去青岛两三周再回来，我和婆婆为他准备了平日省下的十多斤小米，婆婆为儿子做了一双帆布面的新鞋。天亮了，这天，邻居家办喜事，婆婆很早就去那家帮忙去了，田玉山起床后，说，明天船离港前再拿米和鞋，他去上船，我去推小磨。走时，他和我没多说一句话，我也没仔细再看他一眼，更没有一句贴心话，给他准备的小米和鞋是转天别的船员给带走的。他走了，一走竟是四十年。

他走后几个月，塘沽就解放了。街道让我当街道代表，当时都是义务制，家里生活只靠公公卖土豆，卖红果维持，实在困难。经街道和区劳动局介绍，我先后为港务局的一位工程师、新港船厂田副厂长家做保姆。给他们看小孩、做衣、洗衣、做饭，每月有十几元收入。我细心地照看着他们的孩子，喂饭，哄他们玩笑。每当我自己吃饭时，想起自己的孩子在家不知怎样了，不知婆婆，公公老人家怎样了。做母亲的不能照顾孩子，做儿媳的又是唯一的儿媳，不能照顾老人家，我心里非常难受，时常自己落泪。这样我坚持了八年。回到家我在小盐滩干熬卤水、压蛤蜊皮的活。这两项工作条件都较艰苦，但只要能有收入，能解决点家庭生活困

难，我就坚持干。新港船厂田副厂长在解放战争中肠子被打了出来，受过重伤，他的孩子我给带到上了幼儿园，但孩子离开我，不吃不喝只是哭闹饿得很瘦了，田家又把我请回做保姆，后来孩子大了，经田副厂长介绍我到新港船厂行政科干临时工作，负责布置会场，摆桌椅，挂旗子，还给各办公室送煤。每月有30多元收入，我干了三年。

合作化后，我公公到东沽副食小铺工作了。两个孩子在政府的帮助下都免费上了学，长子初中未毕业为解决生活困难提前分配了工作。政府还每月给我定期生活困难补助，但有一次婆婆病了，我为她做了一碗面条吃，有人看到了说：“他家困难还吃面条。”我穷有骨气，从此我不再领取政府给的补助。

田玉山刚走时，全家还认为过几天他就回来了。我们一天天地盼着。长子喜荣四岁时，听见轮船汽笛鸣叫声，便登在高岗上，向轮船招着小手喊“爸爸的船来了，呜呜地叫了”。那时我和婆婆还都不让他召唤。孩子大了，在学校里、在院子里和小朋友玩时，有时打了起来，哭着跑回来对我说：“他们打我、骂我、说我没有爸爸”，孩子的奶奶说：“别打架，要听老师的话，别听他们的。”我在旁边暗自落泪。

每年春节，东沽的居民，家家户户清扫房屋和庭院，贴上春联，年画，到处焕然一新。除夕晚上，节日气氛更浓了。邻居家劈劈啪啪的鞭炮连绵不断，家家有欢乐的祝福。我家每年春节，婆婆都在桌上给儿子摆上一双筷子，盛上一碗饺子，给他留一个空空的位。当我跪在公公、婆婆面前代替丈夫给两位老人磕头拜年时，一句话也说不出。公公婆婆让我过来吃饺子，我哪吃得下，躲在锅台那，冷冷的泪

水，顺着两颊流进嘴里，又流进心里。我不能让公公婆婆和孩子们看见我的悲伤，影响孩子们过年的兴趣，勾起老人想儿子的心情，我强打着精神，巴不得这春节很快过去。

一天夜里，天空黑漆漆的，星星全给乌云吞没了，周围静极了，两个孩子香甜地睡着。忽然外间屋门口，公公用鞋敲打着门框，压低嗓子悲切地喊着田玉山的小名“拴柱拴柱你快回来啊，快回来！”声调凄凉哀怨，并且抽抽噎噎地哭着。

在这样静的夜里，他老人家突然的举动，这凄惨的哭喊声，起初使我有些受惊害怕，转而更引起了我对丈夫的思念。婆婆也被惊醒，她怕公公的声音吓着孩子，说：老头子，大黑天的，玉山要是在船上，你把他召唤出来，再出了事，怎么是好。”说着我和婆婆都哭了，我怕婆婆年岁大，昼思夜想的伤了身体，就劝她不要哭了。她想儿子，她就这一个儿子，还不知道哪里去了，死活不知，怎么叫她不想呢！我把头用被子盖住，涕泪交流地哭着，泪水浸透了被头。

1961年腊月，东沽藉的香港船员马云州先生，随船去了台湾。在码头上恰好遇上了田玉山，马云州向他介绍了我们一家的情况，他也向马先生述说了他在台的生活。马先生回到香港写信将此事告诉了我们。婆婆得知儿子还活着，她抓住那封信抱在怀里，痛哭着。没过几天，她病倒了。我请来了大夫，也查不出她有什么病。她不想吃、不想喝，一天比一天消瘦，嘴边经常念叨着儿子的名字。过了一段时间她身上全黄了，病情越来越重。有一天她感到喘不过气来，我抱着婆婆，婆婆的头趴在我的肩上，嘴里流着口水。我说：“妈您不能走啊，一定要等到玉山回来啊！”这话象一针强心剂，她又痛苦地坚持了八天，八天后，她离开了我们。

我的长子喜荣 1967 年结婚。典礼那天，婚礼主持人让我与公公都坐好，接受刚进门的儿媳行礼认亲，我不想坐在正堂接受孩子们礼拜，我怕坚持不住，喜庆日子里落泪给孩子们带来不吉利，如果孩子他爸在多好啊，可现在只有公爷和婆婆，我躲到厨房，含泪坚持着摸摸这干干那，听着儿媳进门时的鞭炮声，听着婚礼主持人喊着“拜见公爷，给公爷三鞠躬”。我一阵阵心酸好难受啊！

公公自当了公爷后想念儿子的心情更重了，特别每年中秋节，孩子们睡下后，他老独自一人站在院中，望着空中圆月想着远在天边的儿子，傻楞楞地在月下站到深夜。

公公太累了，太愁了，他病倒了，1969 年阴历九月初九，公公的病情越来越重，那天公公躺在床上，眼睛瞪得大大的，望着门口，象是召唤着远在天边的儿子回来快看看他，但他什么也没盼来，连第二封信都没有。我哭着问公公还有什么嘱咐的吗？他睁着眼，一句话也说不出，老泪从眼角流下来。我的长子喜荣说：妈妈别哭了，也别喊爷爷了，爷爷再坚持几天就更受罪更痛苦了。”我不再哭了，也未再让公公等儿子回来，公公睁着圆眼睛，抱憾地离开了我们。

送走了两位老人。我顿时觉得肩上的担子更重了。虽然两个儿子都已结婚生了孩子。我已当了奶奶，但总觉得家不是一个完整的家。特别是我身患胆结石又有心脏病，胆结石病必需手术治疗，大夫们讲患心脏病做手术，成功的把握不大，孩子们盼着我将病尽快治好，三年间先后送我到天津、塘沽医院、港口医院，六四一医院住院治疗，为的是让我坚持到田玉山返回家乡与我们见面的那天。手术时，我的长子在手术意见书上签了字。我看到别的病友老俩口互相照顾非